



摘自《何以汉服》，左丘萌著、立青绘、岳麓书社2025年4月出版。

推荐理由:马王堆汉墓服饰是“汉服”这一概念的源头。本书围绕马王堆汉墓服饰实物,对照战国秦汉时代服饰实物及简牍文书记载,带领大家细看楚汉数百年的服装时尚变化,探索古人制衣的巧技与用心,多角度展示马王堆汉墓服饰的制作细节,解读服饰蕴含的先秦旧礼与汉家新制。

马王堆汉服:走近古人的衣橱

辛追夫人的时尚品位

人们常有这样一种认知,认为历朝历代都是规矩严明,甚至朝廷对于服装如何制作都有严格的规格限定,进而又引申出了一种更深的误解,认为古人的服饰总是处在规矩之中,一成不变,但只要一改朝换代,人们的服装又立刻改头换面,不复前代规制。

这一误解的形成,大概和历代史料中大量明文记载的服饰制度相关。至少从汉代开始,朝廷对于什么人穿什么样的服装,用什么服装面料和色彩,就已经作出了大量规定和限制的尝试。但很遗憾,这往往也只是尝试。实际规定落实到什么程度,要结合实际的时代背景与具体的考古发现来看。

这里简单讲讲古人的“时尚”:其一,古代的贵族阶层的奢侈消费总是追求时尚,有着求新求变的动力。在很多时候,正因为他们这方面的行为过于夸张或者奢靡,让朝廷看不下去,才会颁布禁令,这时的官方规定总是滞后的,往往时尚风气都已逐渐变易,相关律令才姗姗来迟。

其二,还有不少时期,官方禁令不过是一纸空文,存在“法不责众”或“法难责众”的情形。在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的情形下,上到贵族阶层,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了追逐时尚的底气。社会上上下下为追求时尚,出现了普遍逾越制度的情形。

其三,每当王朝建立或新帝继位的时候,统

治者很可能会制礼作乐、颁布新规。围绕或迎合统治者的意愿与爱好,新的时尚也在形成。上行下效,这类时尚大多是先在皇宫中兴起,再逐步传到宫外,流布四方。

总的来说,服饰时尚总是在不断演化发展。它有时会依附朝廷颁布的规制,但不少时候也会超越规制。研究古代服饰之前,必须对此有所认知,服饰是处在生活之中,被人们实际穿着使用的,它们展现着古人的审美偏好和生活态度,并不只是僵死不变的规制。

马王堆汉墓,可以说是历史这片天空中特别耀眼的一颗恒星。在它的指引下,我们可以在时间的夜幕里寻找到研究方向。但它始终只是一颗星星,无法代表天空的全部。研究者需要进一步细致辨明,墓中服饰类文物具体能够代表哪一块地域、哪一段时间的时尚流行。

现代人常说的一个时装搭配模式“老钱风”,顾名思义,就是“有钱了很久”的有钱人的穿搭风格。而马王堆1号汉墓墓主辛追夫人的服饰,可以说是西汉初年楚地的“老钱风”——无论是织锦刺绣的花样,还是服装裁剪的式样,其中不少都可以在战国后期的楚地墓葬中找到文物原型,而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流行服饰存在一定差异。

这一情形或许有助于说明辛追夫人的出身——她极有可能是战国末年楚地贵族家庭出身。即便楚国已经为秦所灭,这些楚地大族在服饰上仍坚持着楚国末年的审美偏好。辛追夫人显然也自幼习惯于这种穿衣风格。于是我们得以观察到马王堆1号汉墓中的情形——即便汉文帝时代朝廷倡导的穿衣风格是节俭为上,这位老夫人还是拥有大量战国后期楚地的旧款风格的服装,宽阔的缘边、立体费料的剪裁是其特征。这些服饰在战国末年的楚地或许还属于年轻人的时装,但时间到了马王堆汉墓所处的西汉文帝时期,可能就已经成为贵族家庭中长辈所坚持的高格调、经典款

了。若辛追夫人先前只是出身民间,直到汉朝建立才跟随丈夫成为朝廷新贵,是不可能具备这种需要自幼培养的“老钱风”品位的,更可能是积极拥抱汉朝建立之后朝廷所倡导的新时尚。

这就是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服饰所呈现的“个性”。我在这里试着给出一个总结:它们代表着战国末到西汉初楚地贵族阶层一小段时间内的时尚流行。

汉代刺绣与将错就错的绣娘

无论是马王堆1号汉墓的辛追夫人,还是3号墓墓主、辛追夫人的儿子利豨,身份都属于贵族阶层,与身份相应的礼制规矩是贵族阶层彰显身份的重要元素。这些礼制规矩,除了延续自前代的“老礼”,还有本朝建立的“新规”。“礼制”代表着官方明确给出的标准,比起“时尚”而言,并不局限于某时某地,更为普及和广泛。

本书正文中有详细的说明:马王堆3号墓中呈现的贵族男性的冠服形象,与秦汉时代的礼制紧密相连;而1号墓辛追夫人的服饰,则呈现出了更多先秦礼制的元素。在目前考古资料还不算充分的情形下去推想,这可能是因为辛追夫人是利豨的母亲,年岁更长的缘故;也可能是当时汉初建立冠服制度时更多的限定是涉及贵族男性,至于贵族女性的服饰反而更有自由的空间,老夫人才能任性地坚持自己楚地旧贵族风格的服饰品位。

但1号墓中也有很多呈现汉朝新制度的特点。比如最为明显的是,为了符合汉文帝倡导的节俭精神,墓中随葬品中原本该有的金珠宝玉,都被替换成了土木质地,“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的明器,其中甚至也包括辛追夫人头上的饰品。本书前文中通过对照墓中出土的丝织品,也发现了有意思的地方:一种特别的刺绣花样——“乘云绣”,广泛出现于西汉初直到西汉末南北各地各大贵族的墓葬之中(甚至东汉时代的织锦,也还在挪用已残缺不全的“乘云绣”花本)。这种绣样不是简单的风格

类似,而是纹样布局完全相同,显然出自同一个花样底本,源头很可能是同一个设计师。背后明确体现的是一种整齐划一、规定严格而且被广泛长期执行的制度。这件带有“制度化”刺绣的衣物被郑重地放在辛追夫人棺内的上层。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织绣印染的花样能够在跨度极大的时间与空间中找到同类文物参照。这可以说明,在马王堆汉墓的时代,贵族阶层的服饰已经有了相当成熟完备的规制了,而且这些规制在汉朝疆域内被沿用了数百年之久。但这种规制具体表现在细节的图纹与面料上,至于服装的款式似乎还是相对自由的。

再来看看辛追夫人衣衾包裹中的刺绣衣物。几大刺绣花样又可以分出各不相同的几个亚型,反映出绣娘在绣制时有更为自由随意的发挥。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是其中的一件黑色罗绮地上绣“信期绣”的衣物。这件衣物虽然已经比较残缺,但大致还能看出几个大块残片在原本衣物上所处的位置。其中主要使用的“信期绣”是一个固定的花样底本在不断循环。但某个绣娘在绣制时竟然出了差错——她错拿成了另一个刺绣花样底本。等她意识到这个失误之时,错拿的花样已经绣在了珍贵的罗绮上,于是只能将错就错,仍把这块花样不同的绣片裁入衣中。

对照礼制记载来推想,这件衣物很可能是辛追夫人等级最高的一件礼服。若没有两千多年后纺织考古学者的细心辨认,谁能想到这件礼服上竟藏着这样的小差错。这个发现虽然无助于提供什么新认知,但至少可以说明,制定和执行规矩的都是人,具体到绣花这件小事上也一样。正是这种人曾经生活过、工作过的痕迹,才让冰冷的物件有了温度。我想到汪曾祺先生描写沈从文先生研究文物的一句话:“对美的惊奇,也是对人的赞叹。这是人的劳绩,人的智慧,人的无穷的想象,人的天才的、精力弥满的双手所创造出来的呀!”

第六,比较视野与思想定位的拓展研究。该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突破在于构建了立体化的比较研究框架,通过横向与纵向的双重维度,全面把握王充思想的历史定位。在横向比较方面,作者将王充置于汉代思想谱系中进行考察,特别是与主流汉儒思想的对话关系。第四章通过细致对董仲舒等汉儒构建的“灾异论”与王充提出的“自然论”,本书不仅揭示了二者在天人关系认知上的根本分歧,更凸显了王充思想中独特的理性批判精神。这种比较研究超越了简单的观点对照,深入剖析了不同思想体系背后的认知逻辑和价值取向。在纵向比较维度上,作者将王充思想置于从先秦到魏晋的思想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一方面追溯其思想与先秦诸子(特别是道家自然观)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探究其对魏晋玄学的潜在影响。这种历时性的比较研究,既避免了孤立看待思想家个体的局限,又准确把握了思想发展的内在连续性。本书不仅准确定位了王充在汉代思想史坐标系中的位置,更深刻展现了其思想对后世中国思想发展的潜在影响,为理解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思想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七,中下层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书写。以往研究多聚焦董仲舒、扬雄等精英人物,本书则以王充为个案,揭示了思想史中被遮蔽的“边缘声音”,展现了东汉前期中下层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的普遍困境:他们既以学问“济世”自期,又不得不在功名压力下“利己”;既批判俗儒的功利化,自身却难以摆脱时运桎梏。他们的思想或许缺乏体系性,却真实反映了时代的精神焦虑与价值冲突,为理解思想史的多元脉络提供了鲜活个案。这种“边缘群体”的精神史书写,突破了以精英思想为中心的叙事模式。王充对民间信仰的批判与妥协,展现了精英思想与民间文化的复杂互动。此类研究可拓展至汉代方术、谶纬等领域,深化对思想史多元脉络的理解。

总之,《济世与利己》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与历史温度的典范之作。作者以细腻的文本解读与宏阔的学术视野,成功地将王充从“反叛偶像”或“宿命论者”的标签中解放出来,将其还原为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的鲜活个体。通过“疾虚妄”这一核心概念的再阐释,本书不仅重构了王充思想的复杂图景,更以方法论的自觉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一步的文案写作。

周作人的这本《知堂谈吃》,实则有益于读者尤其是青少年重新思考应当如何对待叙事。即如书中收入的《喝茶》一篇,这其中较多地加入了周作人对于中国茶饮、西洋茶饮、日本茶饮方式的态度,也谈及中式茶饮虽为饮用清茶,却在茶馆等场所配以口味浓厚的佐餐小吃,反而降低了饮茶的整体体验。通篇下来,叙述和议论较为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而《谈酒(一)》则充满了自嘲,顺带回顾了自己童年时家道未曾中落时的温暖往事。

《知堂谈吃》书中收入的文章,如前述,能够很好地将引用与其他表达方式融合起来,也不堆砌。散文、随笔作品,尤其是文坛大家的作品,往往容易过多引用,加重读者的阅读负担。文人之间的争议中,也经常提出对方过度引用等于卖弄的批评。对于中小學生而言,周作人的《知堂谈吃》中的一些文章,引用比重其实很高,但这些引用能够比较自然而有效地服务于作者的叙述框架,而且周作人即便在大段引用后也能够给出点睛之笔的评论。

大家读书

解构与重构

商钰琦

《济世与利己:王充以“疾虚妄”为中心的思想世界》,马小非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



最大突破在于对“疾虚妄”从批判工具到生存哲学的创造性解构。作者指出,“疾虚妄”不仅是王充批驳神学迷信的理性工具,更是其应对现实困境的生存策略。例如,第三章中,王充将人的命运归为先天注定,剥离儒家命论中的道德主体性,既是对汉代选官制度的隐性批判,对儒家道德决定论的解构,亦是对个人仕途挫败的自我慰藉。而在第四章中,王充从操作层面和理论层面对汉儒宣扬的“天人感应”之说予以抨击,并指出这是“神道设教”的手段。他以自然主义否定灾异和祥瑞与人事关联,指出一切灾异和祥瑞的发生都是偶然。其观点既源于“通人”的理性精神,亦暗含为君主开脱的政治考量,隐现其谋求仕进的功利诉求,“为汉平说”同时也有媚上自荐之意。这一视角打破了“进步性-局限性”的二元框架,将思想还原为个体与时代对话的动态产物。

第三,对王充思想矛盾根源的深刻剖析。《论衡》所示王充思想的种种矛盾根源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命论”。一方面,他肯定教化对道德修养的改变作用;另一方面,又一再强调命运的必然性,主张人只能被动接受而无法主动掌握命运,这种“极端命定论”否定了道德努力的意义,也暴露了王充思想的内在矛盾。王充命定论的形成源于他的自身遭遇,他无法跳出时代批判选官制度不合理,对道家自然学说的吸收又使得他进一步坚信命运中没有因果律。他自认才华横溢,道德上也并没有瑕疵,但仕途坎坷,最终把种种原因归结为命运的先天主定,并且在著作中极力想要证明这一点。这既是对个人内心的安抚,也是向外界表明自己的境遇并非个人因素造成的,为自己辩解发声。

第四,对王充独特“济世”情怀的关注。王充以自然主义思想为基础,系统性地否定了“人死为鬼”的传统观念,并对当时盛行的厚葬之风与神仙信仰展开深刻批判,主张简化丧葬礼仪,改革祭祀

是吃,但更重要的是在谈论吃以外,对待现实生活的某种气质和风度。

周作人笔下往往从野菜、小吃引出纵议,笔调清静,节奏明快,不拖泥带水,引用、联想、回忆随手拈来。本书作者的文笔以华丽见长,但不流于堆砌矫饰。《知堂谈吃》书中收入的文章,比较好地示范了散文、随笔写作。

现在可见的很多散文、随笔作品,包括被收入中小学语文教材、阅读指南的作品,都很难做到像《知堂谈吃》这样以极短的篇幅、明快的节奏来处理叙事。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至少一部分学生的行文风格,让孩子误认为无论处理什么样的作文题材和题目,都要仿效常见作品那样“蓄力”开局,不时刻意地堆砌价值观、

铺陈思想感情。很显然,这恰恰就是很多孩子对于语文课、写作文望而生畏的原因之一。因为“蓄力”、用力、刻意的叙事,有违于写作者自己的日常表达习惯,无论是书面表达还是口头表达,也有违于普通读者的接受习惯,着实影响文章作为交流手段和工具的效果。

近年来,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我国,一些大学因为文科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不佳,因而开始大幅度地裁减文科专业。就业问题可探究出很多原因,但人们常常忽视的一点是,大学生在校期间练习专业学术写作技能,而不再进行最基本的叙事能力的培养。这就造成至少一些学生可以写出论文,却写不好自荐信,在实习和工作中无法驾驭诸如信件、通知、周报,或者更进

周作人笔下的气质与风度

郑渝川

分享悦读



著、锺叔河编订、岳麓书社2025年3月出版。

《知堂谈吃》全面收录了著名散文家周作人关于“吃”的随笔181篇,由著名出版家锺叔河精心编选和校订。全书装帧精美而不失朴实,让人在阅读中得以抵达民国随笔大家的思想境界深处。

如全书编者锺叔河所说,周作人谈论的

好书推荐

用科幻赋能神话 打造当代新传奇

刘健



2025年一月出版。
国大百科出版社、知识出版社
《雷池渔歌》,马传思著,中

在很多普通读者的认知中,科幻小说是地道的舶来品,其中似乎总是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翻译腔”,总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幻想文学底蕴,而古籍《列子·汤问》中关于“偃师造人”的故事,更是与现代科幻小说中的机器人题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而,如何以科幻文学的形式,延续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幻想文学传统,使之更加具备民族特性,以获得更多读者的喜爱,就成为摆在每位科幻创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而著名科幻作家马传思的科幻小说集《雷池渔歌》,就提供了这道题目一个“优解”。

作品巧妙地将科幻与神话元素相融合,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世界的大门,在充满想象力的故事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与人生哲理,对青少年读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与教育意义。

《雷池渔歌》以江南小镇为核心舞台,生动展现了一群少年的成长轨迹,勾勒出江南小镇的独特风情画卷。在这里,雷池与千年古镇承载着历史的厚重,现代科技与传统元素相互交融,人类与能量波生命体“神龙”、异形智慧生命“净水”、鲛人、僧侣、古老的丹尼索瓦人等多元角色和谐共生,共同奏响了一曲充满奇幻与智慧的文明乐章。

虽然是一部科幻小说集,但从最基本的谋篇布局层面,就展现出了作者独到的创作功力。表面上,四个故事各自独立,分别围绕小松、星宸、梓旭、阿枫四名少年展开,他们的生活看似毫无交集,然而,江南烟雨和雷池古镇作为共同的背景纽带,将他们紧密相连,而“神龙”与“净水”这两个关键元素更是贯穿始终,使整个作品在分散的情节中保持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收放自如的叙事节奏。

而在内容层面上,书中的故事则展现了作者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同样令人赞叹。作者巧妙地将古老神话与现代科幻元素无缝对接。无论是小说中各种的奇妙设定,还是鲛人与古寺的情节设计,都突破了常规思维,为青少年读者开辟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甚至为他们未来参与科普科幻创作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更值得称道的则是,作者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深深地嵌入到作品之中。通过将江南地域文化、民间习俗的细腻描绘,如古镇风貌、黄梅小调、传统节日等元素的融入,让青少年读者在阅读中深入领略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同时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思想主题方面,本书借助四位少年的独特遭遇,深入挖掘并彰显了一种融合外星智慧生命的惊奇与江南烟雨温婉诗意的“水之道”。这一主题蕴含着深刻的生态观,倡导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共生;将水比作人性的镜子,通过一系列故事展开关于大善与博爱的思想实验,最终在“江南烟雨”这一文化意象的滋养下,凝聚出超越物欲纷争,追求恬淡人生境界的生命内涵与道法天地的宇宙观。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度哲学提炼,更是一次借助科幻文体让古老文明在当代焕发新机的一次成功尝试,为青少年读者打开了一扇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之美的窗户。

而作为一部少儿科幻作品,《雷池渔歌》更是展现了高段位的“寓教于乐”的特征。书中少年们在困境中展现出的勇敢、智慧、善良、坚持等品质,以及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对自我、家庭、社会和自然的思考与探索,为青少年读者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指引。引导他们在成长道路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与社会责任感的。

综上所述,《雷池渔歌》是一部极具价值的青少年科幻文学作品。它巧妙地融合了科幻与传统文化元素,以精彩的故事、深刻的主题和独特的结构,满足了青少年对奇幻冒险的阅读渴望,同时提升了他们的文化素养与思想境界。无论是在课余闲暇时光,还是在成长的关键阶段,这部作品都能成为青少年读者的良师益友,引领他们在文学的海洋中畅游,汲取成长的智慧与力量,助力他们茁壮成长,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天津市科普作协理事